

皮子文藪



〔唐〕皮日休著 蕭滌非整理

皮子文藪

中華書局

皮子文薈

(唐)皮日休著

蕭滌非整理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興業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 5 印張 • 84,000 字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3,700 定價：(7)0.46 元

統一書號：16018 • 172 59.6. 溫型

前言

一

『皮子文藪』十卷，是晚唐現實主義詩人皮日休自編的一部詩文集。一至九卷是各種散文，第十卷是詩歌。

關於書的命名和編輯經過，作者在『文藪序』中曾作如下說明：『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壽州）東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於有司。發篋叢奉，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咸通丙戌，是唐僖宗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也就是黃巢大起義的前十年。

我們知道，唐代最重進士之科，但當時考試還沒有糊名的辦法（試卷糊名始於宋真宗），一個人及第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平素文名。爲了取得公卿們的吹噓，當時舉子們通常是在考試之先將平日所作詩文編成卷子分頭投獻，叫做『行卷』。假如落第，那麼第二年就再獻，叫做『溫卷』。自序說『編次其文，復將貢於有司』，可見就是『行卷』、『溫卷』一類的東西。

『行卷』，一般的說，是不會有多高價值的。但對『皮子文藪』我們却不能不另眼看待。這是

因爲作者並不曾爲了博取大人先生們的喝彩，故意寫些春風滿面的文章，而是堅持着自『詩經』以來便已形成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他的創作動機，正如他在自序中說的，是要『上剝遠非，下補近失。』他認爲：『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正樂府序』）所以他力求做到『句句考事實，篇篇窮玄虛。』（『奉酬崔璐見寄』）而『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桃花賦』序）這種文藝觀點，和白居易的『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正是一脈相傳。因此，盡管這是一種『行卷』，但作者仍能相當全面而深刻的反映了那個即將到來的農民大起義前夕的社會現實。周揚同志說：『文藝是時代的風雨表。每當階級鬭爭形勢發生急劇的變化，就可以在這個風雨表上看出它的徵兆。』（『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皮子文藪』便正是它那個時代的風雨表。

魯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險』一文中曾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諷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爲隱士，別人也稱之爲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場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鋇。』從這段極其概括的話中，也就可看出『皮子文藪』的價值和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了。

的確，在『皮子文藪』中是有着不少的鋒鋇畢露的尖銳諷刺的。比如他說：『古之置吏也，將

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均見『鹿門隱書』篇）所有這些託古諷今的話，都可以說是一鞭一條痕，一抓一掌血的。他還說：『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害己；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這番話也很深刻，能發人深省，具有唯物主義的觀點。

不僅如此，對整個封建時代一貫推崇的所謂開國之君的本來面目，他也作了大膽的揭露。他說：『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尙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尙權，驅赤子於白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讀司馬法』）原來所謂創業垂統的聖帝明王，從皮日休看來，都不過是屠殺人民的最大的劊子手而已。正因爲如此，所以他沒有把皇帝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來崇拜，而是認爲：如果皇帝不好，老百姓即使把他掐死甚至滅族，也不算過分。『原謗』篇說：『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爲堯舜之』

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爲甚矣。『這種民主思想，雖受到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的啓發，但更爲大胆而徹底。孟子還是多少爲周武王辯解，而皮日休則是完全替人民講話的。這正是後來作者參加黃巢起義軍的思想基礎；而黃巢起義的徵兆，也於此可見，因爲這種思想乃是當時階級鬥爭尖銳化、表面化的反映。

據『北夢瑣言』卷二，皮日休是咸通八年，即編定『文藪』的第二年『榜末及第』的。這不能不令人奇怪：『讒書』的作者羅隱『十上不第』，所以羅褒贈詩說『讒書雖勝一名休』。徐夤贈詩也說『讒書編就薄徒憎』。可見羅隱正吃了『讒書』的虧。那麼爲什麼皮日休却能憑『文藪』而一舉成名呢？我最初頗不解，后見『南部新書』卷內載：『大中（宣宗年號，公元八四七至八五九）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曰榜花。』這才恍然大悟，皮日休之以榜末掛名，在很大程度上叨光了他的尊姓。不成問題，作爲統治階級用來僞裝公道以平衆憤的一個點綴品，所謂『榜花』，姓皮的要算是最有資格的了。皮日休及第後，並不得意，過了幾年才弄到一個太常博士，所以他曾憤慨的說：『季氏唯謀逐，臧倉只擬讒。』（『江南書情二十韻』）這才是權貴和宦官們對他的真正的態度和對『文藪』真正的『評價』。

像這樣一部光輝的創作，我們花點工夫加以校勘和必要的斷句，是完全應該的。

『皮子文藪』十卷，從最初編定時起，在文壇上便享有很高的聲譽。陸龜蒙和皮日休詩說：『近者韓文公，首爲開闢鋤。夫子又繼起，陰霾終廓如。搜得萬古遺，裁成十編書。』所謂十編書，即指文藪十卷。龜蒙此詩作於咸通十年或十一年，距編定時不過三四年。由此可以推知，『文藪』十書，當時傳抄，必很普遍，所以北宋初姚鉉編『唐文粹』得以大量採錄，後來『新唐書』的『藝文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也一直有著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文藪』的刻本，個人所見有以下幾種：四部叢刊影印袁氏明刊本、盧氏據明仿宋本（見『湖北先正遺書』）、明刊殘本（缺首頁柳開序及次頁文藪序之半）、于氏影宋本（光緒八年刻）、全唐文本。這裏，是以四部叢刊影印本爲底本，而以其他各本互校，並參考一些載有皮文的選本，如『唐文粹』、『涵芬樓古今文鈔』等；詩的部分則主要是用『全唐詩』，並校以最近影印的宋刊『樂府詩集』。共計校出脫文、誤文、衍文、倒文等五百餘條，雖不敢云盡善，基本上是可讀了。

在校勘中，也會碰到這種情況：明知某字必誤，但各本都無異文，如『通玄子栖真亭記』，篇末明載『五年（咸通）五月朔日記』，但篇首却有『五年冬』的話，這個『五』字顯然是錯誤的，但各

本都作『五』。在這種情況下，我有時只是指出某字有誤，有時也提出意見，如某疑當作某之類，不徑改原文。

只有，當文中所引與原書不符時，則即使各本均同，也予以校改。例如『無項托』篇：『嗚呼，項氏之有無，亦如乎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子之稱墨尿、嫫嫫也。』按列子『力命篇』云：『墨尿、單至、嫫嫫、慙慙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尿音賦。『方言』：『小兒多詐而獯，謂之嚙尿。』把列子錯成墨子，這很可能是由於皮日休的一時誤憶，只要指出就行，不必去改；但『尿』當作『屎』，『嫫嫫』當作『慙慙』，則是可據原書而予以改定的。又如『憂賦』篇：『西漢則中令扇迹，東京則鄴卿構基。』這兩句是說宦官專權的。『中令』指石顯，顯在西漢元帝時爲中書令（見漢書卷九十三佞幸傳）。『鄴卿』應作『鄴卿』，指鄴衆。東漢時和帝封鄴衆爲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見後漢書卷一百八宦者傳）。但各本『鄉』都作『卿』，顯由二字形近而誤，也是可據原書改正的。

關於『點』的方面，這裏只用了逗號和句號兩種，但點起來也頗不簡單。『唐語林』卷二說：『元和（憲宗）已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皮日休最推崇韓愈的散文，如『讀韓文公配饗太學書』說：『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並推爲『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所以他的文章也是學韓愈的（陸龜蒙說他是韓的繼承人，並非瞎捧）。不僅有韓愈的

『奇』，還帶點樊宗師的『澀』，因而不大好點。

『文藪』所收文章，據自序，應該都是咸通七年以前寫的。但『河橋賦』序却有『咸通癸巳歲，日休游河，著河橋賦』的話。癸巳是咸通十四年，顯與自序矛盾。繆鉞先生疑『癸巳』爲『癸未』之訛（四川大學學報二期：『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按癸未是咸通四年，這年春，日休已由襄陽南下郢州（湖北鍾祥縣），一路往東南走去，這年秋，他到了南京（見『白門表』），而『答繇碑』又有『五年春，日休自淝陵（安徽壽縣）之江左』的話，可見，在咸通四年他不可能又北上洛陽。

按全唐詩有皮日休『洛中寒食』七律兩首，第一首末云：『唯有路傍無意者，獻書未納問淮肥。』肥卽淝陵，亦卽書序所謂『州東別墅』的『壽州』。可見，皮日休咸通七年落第後，曾由長安取道洛陽到安徽去。又第二首云：『遠近垂楊映鈿車，天津橋影壓神霞。』可見他在洛陽曾游河橋（『河橋賦』所賦的橋卽天津橋）。因此，我認爲『河橋賦』和『洛中寒食』二詩當是同時之作，都作於咸通丙戌（七年），『癸巳』可能是『丙戌』之誤。『丙』字壞其兩邊，更易誤猜作『癸』字。這個錯誤，大概在最初的傳抄階段便已有了，因爲現在各本都作『癸巳』。總之這篇賦決不會是咸通十四年作的，因爲早在咸通七年所作的書序，已有『慮民道艱難，作河橋賦』的話。

還有一種情況可以作爲旁證，那就是唐人雖愛詩如命，對於賦却不感興趣，只是爲了考進士不得不學這一手。一旦成名，他們便把它丟到九霄雲外，再不爲它絞腦汁，連大詩人杜甫、白居易都不例外。皮日休也是這樣。他一共寫了四篇賦，《河橋賦》外，《霍山賦》、《憂賦》、《桃花賦》都是及第前寫的，及第後，他便專意寫詩了。所以即從當時寫作風氣來看，《河橋賦》作於咸通十四年（即及第後六年）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三

現在，要談一談有關《文藪》的作者皮日休的一些問題。

日休先字逸少，後改襲美，湖北襄陽人，居鹿門山。他曾給自己起了一連串的外號，什麼《閑氣布衣》、《醉吟先生》、《鹿門子》、《醉民》、《醉士》等等。

他的主要活動時期是咸通至廣明的二十年間。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我們且看韋莊的《咸通》詩：『咸通時代物情奢，歡殺金張許史家。破產競留天上樂，鑄山爭買洞中花。諸郎宴罷銀燈合，仙子遊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華。』陸龜蒙的《村夜》詩更概括：『萬戶膏血窮，一筵歌舞價。』貫休的《東陽羅亂後懷王愷使君》詩也說：『無人與奏吾皇道，致亂唯因』

酷吏來。剗剗生靈爲事業，巧造豪僭作梯媒。『原來當時統治階級的生活是那樣的糜爛腐朽，而他們的壓迫和剗剗也竟然到了以『剗剗生靈爲事業』的地步。這就是皮日休生活於其中的時代環境，也就是『文藝』創作的社會基礎。（應該指出：這個『剗剗生靈』的『事業』，乃是最高統治者和他的爪牙們所幹的共同事業，實休把酷吏和皇帝分開，好像和皇帝無關，則是不對的。）

皮日休的出身是個道地的『寒門』，够得上說是個『農家子』。他自言：『至於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文取位……自唐以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一作抱）冠冕，以至皮子。』（『皮子世錄』）而據陸龜蒙詩：『老牛體不行，力弱誰能鞭！』可見他少年時還確實有過一段勞動生活。

文藝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但不接觸現實也就不可能反映現實。皮日休所以能够成爲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和他的勞動生活以及那種『對燈任鬚鬚，憑案從肘研』的苦學精神固然有關，但廣泛的深入社會生活更是一個重要條件。他在『太湖詩序』中曾說到自己的行踪：『南浮至二別，涉洞庭，迴觀數淺原，登廬阜，濟九江，由天柱抵霍嶽，又自箕嶺轉樊鄧，陟商顏，入藍關，凡自江漢至於京，千者十數侯，繞者二萬里。』（全唐詩皮日休詩卷三）這種廣泛的閱歷，無疑，對他的創作和後來終於參加農民起義都有很大關係。『文藝』中有不少好作品便是在『繞者二萬里』

的過程中寫成的。

但是，作爲曾經參加農民起義這樣一個在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作家，皮日休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問題。這裏我想簡要的談談以下三點：

第一是生年問題。聞一多先生的『唐詩大系』（聞一多全集第四冊），定皮日休的生年爲公元八三三，現在一般文學史也都定在這一年，但可惜他沒有提出證據。按『唐文粹』卷五十一所載皮日休的『文中子碑』有這樣一句：『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日皮子。』文中子是王通，生於隋文帝開皇四年（公元五八四），從公元五八四到八三三，恰是二百五十年，這可能就是聞先生的根據。但是，這句話是有問題的，因爲各本『皮子文藪』都作『二百五十餘年』。而且，即使照二百五十年算，但既是『後』，那也應該是公元八三四年。我以爲皮日休當生於公元八三四至八三八的幾年間。好在這問題關係不大，可不贅。

第二是爲黃巢翰林學士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爲關涉到皮日休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首先要指出的是，皮日休並不是自動的投効黃巢的。『唐詩紀事』卷六十四說日休『遭亂歸吳中（蘇州），黃巢寇浙江，劫以從軍。』『郡齋讀書志』卷四也說日休『爲毗陵（江蘇武進）副使，陷巢賊中。』地點雖不同，但都說是被劫，這大概是可信的。黃巢曾兩度入江浙，一在公元八七

八年（見新唐書僖宗紀），一在公元八七九年（見通鑑卷二五三），被劫從軍，究在何年，則尚難斷定。

皮日休雖是被劫從軍，但從黃巢一入長安便用他做翰林學士而他並沒有拒絕這件事看來，顯然他是傾向於革命的。假如他也像詩人周朴那樣封建頑固，把黃巢看成『賊』，說什麼『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唐詩紀事）卷七十一）那他就不可能接受黃巢的任命。由於當時大部分失意文人對唐政府的怨恨，在社會上形成一股有可能和革命結合的力量，黃巢當時採取了優待儒者的所謂『下士』的政策來爭取他們，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甚至有的被俘的人，只要冒充一聲『儒者』，便能得到釋放，因之當時義軍中曾流行這樣一句政治口號：『逢儒則肉師必覆。』（新唐書黃巢傳）這也就是說，一個書生要從起義軍中逃出來是並不難的。事實也是這樣，像詩人司空圖、韋莊和王徽等人便都是從長安逃出來的。但是皮日休沒有逃跑，這也足以說明他的立場相當堅定。

關於皮日休爲黃巢翰林學士的記載，最早見於舊唐書僖宗紀：

廣明元年（公元八八〇年）十二月，甲申（初五），賊入京城。壬辰（十三日），黃巢據大內，僭號大齊，稱年號金統……以太常博士皮日休、進士沈雲翔爲學士，爲僞赦書云：『揖讓之儀，

廢已久矣；竄遁之迹，良用慨然！」

舊唐書作者劉昫的年代相當早，生於公元八八二年，所記必有充分根據。舊唐書外，歐陽修的新唐書、黃巢傳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卷二五四）也都有記載。根據這些最早的和比較早的記載，皮日休爲黃巢翰林學士這件事，原可肯定，不成問題。

但是，也有人不相信。大詩人陸游就曾一再爲皮日休辯護。他在『跋松陵倡和集』一文中說：皮襲美，當唐末遜於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子孫業文，不墜家聲。至襲美四世孫公弼，以進士起家，仕慶曆、嘉祐（宋仁宗）間，爲韓魏公（韓琦）所知，雖不甚貴顯，亦當世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謗，以謂襲美驕節於巢賊，爲其翰林學士，新唐書喜取小說，亦載之。豈有是哉！比唐書成時，公弼已死，莫與辨者，可嘆也。開禧元年九月十四日。（『渭南集』卷三十）

陸游把皮日休從黃巢看成『驕節』，這種立場，就決定他的態度不可能是客觀的。他攻擊新唐書『喜取小說』，不知已早見於舊唐書。新唐書成書，比舊唐書要晚一百一十五年（新唐書成於公元一〇六〇，舊唐書成於公元九四五），那麼，要駁也得先駁舊唐書，才是正理。所以他這番辯護是不能成立的。

後來，陸游在他的『老學庵筆記』中（卷十），又根據尹洙寫的『皮子良墓誌』（『河南集』卷十五）作了第二次的辯護。他說：

『該聞錄』（此書已佚）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新舊兩唐書都沒有日休被誅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相；父燦，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孫仲容，在仁廟（宋仁宗）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予故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泉下。

陸游這番話也很主觀。他也不想一想，墓誌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文章，在他那個封建時代，像『從賊』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怎樣能寫進一篇『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韓琦『與范仲淹論尹師魯行狀書』語）的墓誌銘裏去？墓誌是要根據死者子孫所提供的行狀的，能不能設想：皮日休的子孫會把這種事老老實實寫在行狀上？如說『師魯文章傳世，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故『可信不疑』。難道歐陽修、司馬光就不是這樣而是要欺後世的嗎？恐怕陸游自己也不能同意這結論吧。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還是尹洙的好友，而新唐書成書又在墓誌之後，要不是確

鑿有據，他又何必和老朋友立異。

由於陸游是位大詩人，而一般文人又都是封建頭腦，這就使得他的辯護很發生一些影響。胡三省就曾把『筆記』那段話引入通鑑注中而不加可否，後人也都採取『未知孰是』的態度。所以我們不能不提出來加以澄清。

最後第三，是死的問題。皮日休的死，有三種傳說：一病死，二遇害，三被誅。

病死一說，見尹洙所作墓誌。墓誌說：『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錢鏐）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照這樣說來，那皮日休自然是壽終正寢在杭州的了。但這是不是信的。理由：如果日休真的在錢鏐手下作太常博士，那他就不可能不同在錢氏王朝的詩人羅隱打文字交道。在唐朝，兩位詩人碰在一起而不你倡我和的，簡直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何況又是在美麗的杭州。但羅隱詩中無一字涉及日休，日休詩中也無一字涉及羅隱，足證他們根本沒有在錢氏王朝碰過頭。又按皮光業所作『吳越國武肅王（即錢鏐）廟碑』（『十國春秋』卷七八），末尾有一段感恩戴德的話，但只說到他自已是一個『二紀幕客，十載廷臣。』（錢鏐正式建國始於公元九二三，死於九三二，相距十年；又建國後，將吏才稱臣，故碑云『十載廷臣』。）不難知道，假如日休真會依錢鏐並作他的官，那碑文便應有『臣父子感恩』一類話頭，現在却一字未提，